

数字经济推进区域发展格局演化的内在逻辑

李 玲, 张姣姣, 仲谦艺, 邓 刚*

齐鲁理工学院商学院, 山东 济南

收稿日期: 2026年9月14日; 录用日期: 2026年10月19日; 发布日期: 2026年10月30日

摘 要

本文构建传统经济与数字经济二维评价指标体系, 采用熵值法、主成分分析法与ArcGIS自然间断点分级法, 探究数字经济驱动下我国区域发展格局的演变规律。研究发现, 传统经济发展主要依靠对外开放, 数字经济则取决于数字基础设施与经济增长条件。数字经济助推各省经济增长的同时加剧区域分化: 东中西差距有所缩小但差距依然显著, 南北差距持续扩大, 传统南北分界线不断北移。数字经济向城市群集聚, 京津冀、长三角、珠三角成为核心高地, 呈现中心化空间结构。本文从时空视角开展双维度研究, 丰富了数字经济评价体系, 厘清了区域发展新特征。

关键词

数字经济, 区域发展格局, 熵值法, 主成分分析法

The Internal Logic of Regional Development Pattern Evolution Driven by the Digital Economy

Ling Li, Jiaojiao Zhang, Qianyi Zhong, Gang Deng*

Business School, Qilu Institute of Technology, Jinan Shandong

Received: September 14, 2026; accepted: October 19, 2026; published: October 30, 2026

Abstract

This paper establishes a two-dimensional evaluation indicator system covering traditional economy and digital economy. With the entropy method, principal component analysis and the natural breakpoint classification method embedded in ArcGIS, this paper investigates the evolutionary law of China's regional development pattern under the impetus of the digital economy. The empirical

*通讯作者。

文章引用: 李玲, 张姣姣, 仲谦艺, 邓刚. 数字经济推进区域发展格局演化的内在逻辑[J]. 社会科学前沿, 2026, 15(10): 672-680. DOI: 10.12677/ass.2026.1510886

results demonstrate that the growth of the traditional economy is predominantly driven by opening-up, while digital economic development hinges on digital infrastructure and economic growth conditions. Although the digital economy fuels provincial economic expansion, it aggravates regional divergence. The development gap among eastern, central and western China has narrowed moderately yet remains substantial. Meanwhile, the north-south divide keeps widening, and the traditional north-south geographical demarcation line keeps shifting northward. Spatially, the digital economy tends to cluster within urban agglomerations. The Beijing-Tianjin-Hebei region, Yangtze River Delta and Pearl River Delta have emerged as core growth poles, forming a centralized spatial structure. This two-dimensional research from temporal and spatial perspectives improves the quantitative evaluation system of the digital economy and identifies emerging characteristics of regional development in the digital era.

Keywords

Digital Economy, Regional Development Pattern, Entropy Method, Principal Component Analysis

Copyright © 2026 by author(s) and Hans Publishers Inc.

This work is licensed under the Creative Commons Attribution International License (CC BY 4.0).

<http://creativecommons.org/licenses/by/4.0/>



Open Access

1. 引言

数字经济已成为我国经济增长的核心支柱,自2015年数字经济上升为国家战略以来,我国正式迈入数字化全面发展阶段。根据中国信通院测算:2022年数字经济规模达到50.2万亿元,占GDP比重41.5%;2023年总量增至55.3万亿元,占GDP比重提升至42.8%;2024年数字经济规模攀升至59.2万亿元,占GDP比重高达43.8%,在整体经济增速放缓的环境下依旧保持9.69%的高速增长,韧性优势凸显[1]。数据作为新生产要素,与传统经济社会系统深度融合,在消费升级、产业结构优化、就业拉动等方面发挥关键作用,为区域经济发展注入新动力。数字经济突破地理空间限制的特性,为西部欠发达地区带来发展机遇,如贵州省依托大数据中心建设及“东数西算”工程,数字经济发展跻身全国前列。但同时,数字经济也重塑了区域发展差距,东西、南北差距较传统经济时代发生结构性变化,区域内部分化亦逐步加剧。基于此,本文选取2013~2020年我国30个省级行政区数据,运用熵权法与自然间断点分级法,分析数据要素介入后区域发展格局的演化规律,探讨数字经济对区域发展格局的影响机制,为推动区域平衡发展提供参考。

2. 文献综述

自Tapscott在著作中提出“数字经济”概念以来[2],数字经济的经济价值与区域发展效应成为国内外学者的研究热点,现有相关研究主要集中于数字经济与区域经济增长、数字经济发展的区域差异与动态演进两大方向,为本文研究奠定了理论与方法基础。

2.1. 数字经济与区域经济增长的相关研究

众多学者证实数字经济是驱动区域经济增长、提升经济发展质量的新引擎,且其作用机制存在显著区域异质性。宋洋借助经济发展质量的EPED模型,从外在表现与内生动力两大维度分析发现,数字经济在六大外在表现、六大内生动力层面均能有效促进经济发展质量提升[3];郑嘉琳、徐文华基于2010~2018年30个省市自治区面板数据构建门槛回归模型,研究表明数字经济影响经济发展质量的过程中,存在显著的环境规制和城市化门槛效应[4];王娟娟、余干军运用熵值法和主成分分析法测度2015~2019年31个省级行政区数字经济发展水平,发现数字经济与多领域的高关联性使其发展的区域差距表现显著[5];刘家

旗、茹少峰基于国际视角,利用计量模型测算 2005~2018 年 38 个国家数字经济规模,得出数字经济对经济高质量发展存在显著推进作用,且发达国家的促进效果明显优于发展中国家的结论[6]。

2.2. 数字经济发展的区域差异与动态演进研究

针对数字经济发展的区域差异及时空演变特征,学者们多采用量化分析方法展开测度与探究,研究方法与研究尺度日趋丰富。刘传明等利用“腾讯互联网+”数字经济大数据平台的城市指数数据,采用 Dagum 基尼系数测度五大城市群数字经济发展的地区差距,并通过 Kernel 核密度和空间 Markov 链揭示其动态演进特征[7];王军等基于 2013~2018 年 30 个省级行政区面板数据,运用描述性统计和泰尔指数从四大地区、五大经济带视角分析区域数字经济发展差异,并结合自然间断点分级法、局部莫兰指数等分析其空间相关性[8];曹萍萍等以 2011~2018 年中国 234 个地级及以上城市为研究对象,通过熵权法测度数字经济发展指数,借助核密度估计法、Dagum 基尼系数法分析其分布动态与区域差异,并利用空间计量模型检验其收敛特征[9];唐先滨选取 2013~2022 年 30 个省级行政区数据,以熵值法赋权测算数字经济发展指数,从省级层面探究了中国数字经济发展的趋势与空间特征[10]。

2.3. 文献述评

整体来看,现有研究已在数字经济发展测度、区域经济增长效应等方面取得丰富成果,大多单独针对传统经济或者数字经济开展测度,较少将两个阶段置于同一分析框架下对比考察区域格局变迁,关于数字经济发展如何推动区域发展格局演化的研究相对匮乏,尚未形成系统的分析框架。本文在吸收已有研究成果的基础上,构建 2008~2013 年传统经济发展质量、2013~2020 年数字经济发展两套指标体系,运用熵权法与主成分分析法,剖析 30 个省级行政区数字经济发展对区域格局演化的内在逻辑,揭示数字经济与传统经济发展的内在关联及区域格局的新变化,弥补现有研究的不足。

3. 指标选取与模型构建

3.1. 指标体系构建

遵循科学性、实用性、规范性原则及数据可获得性,构建双维度评价指标体系,对比分析有无数据要素介入的经济发展水平差异,其中传统经济发展指标体系侧重刻画传统模式下的经济发展特征,数字经济发展指标体系融合传统经济核心指标与数字经济特色指标,突出数据要素的核心作用。

1) 传统经济发展水平指标体系(见表 1):从经济运行、经济结构、社会福利、生态环境 4 个一级指标出发,设置 11 个二级指标、27 个三级指标。经济运行维度聚焦经济增长、经济波动、对外开放三大维度,其中进出口总额/GDP (权重 15.21%)、外商投资总额/GDP (权重 11.34%)在所有指标中权重最大,反映传统经济发展对对外开放水平的高度依赖;经济结构、社会福利、生态环境维度则分别从产业、消费、投资结构,福利变化与成果分配,污染、资源消耗与环境保护等方面刻画传统经济发展的综合特征。

Table 1. Construction and weights of the evaluation indicator system for economic development level
表 1. 经济发展水平评价指标体系构建及权重

一级指标	二级指标	三级指标	计量单位	权重/%	指标方向
经济运行	经济增长	人均 GDP 增速	%	1.74	正
		GDP 增速	%	1.27	正
	经济波动	通货膨胀率	%	0.68	负
		失业率	%	3.02	负

续表

对外开放	进出口总额/GDP	%	15.21	正
	外商投资总额/GDP	%	11.34	正
产业结构	第一产业增加值	—	6.23	正
	第二产业增加值	—	6.89	正
	第三产业增加值	—	6.67	正
经济结构	消费率	%	2.23	正
	生存性消费 人均支出	元	4.31	正
	消费结构			
	发展型消费 人均支出	元	4.11	正
	享受型消费 人均支出	元	3.27	正
投资结构	投资率	%	3.03	正
福利变化	人均 GDP	元/人	4.55	正
	人均受教育年限	年	2.14	正
	失业保险覆盖率	%	7.16	正
	基尼系数	—	3.51	负
	城镇居民 恩格尔系数	%	1.22	负
社会福利	成果分配			
	农村居民家庭 恩格尔系数	%	2.07	负
生态环境	城乡收入差距	元	0.63	负
	环境污染			
	工业废气排放量	亿标准立方米	0.62	负
	工业废水排放量	万吨	1.38	负
	工业固废排放量	万吨	0.61	负
	资源消耗			
环境保护	单位 GDP 电耗	千瓦小时/万元	0.98	负
	单位 GDP 能耗	吨标准煤/万元	1.09	负
	森林覆盖率	%	4.14	正

2) 数字经济发展水平指标体系(见表 2): 涵盖经济增长、数字环境、数字基础 3 个一级指标, 下设多个二级、三级指标。其中每万人拥有的网页数(权重 9.58%)在所有指标中权重最大, 技术市场成交额(7.99%)、软件业务收入(7.68%)紧随其后, 凸显数字基础类与经济增长类指标对数字经济发展的决定性作用; 数字环境维度从创新环境、人才环境刻画数字经济发展的支撑条件, 数字基础维度则从基础设施、网络资源、用户基础、企业应用等方面衡量数字经济发展的硬件与应用基础。

3.2. 数据来源与处理

研究数据来源于《中国统计年鉴》¹《中国科技统计年鉴》²《中国环境统计年鉴》³《中国劳动统计年

¹<https://data.cnki.net/yearBook/single?nav=%E7%BB%9F%E8%AE%A1%E5%B9%B4%E9%89%B4&id=UxAs3gu-RYfE9IFX+dpDfvw==&pinyinCode=YINFN>

²<https://data.cnki.net/yearBook/single?id=N2026030259&pinyinCode=YBVCX>

³<https://data.cnki.net/yearBook/single?id=N2026070067&pinyinCode=YHJSD>

鉴》⁴等官方统计年鉴，及 EPS 数据库、国研网等权威数据平台，根据数据的可得性，本文选取中国 30 个省级行政区为研究样本。针对两套指标体系中 52 个指标量纲与数量级存在显著差异的问题，为确保数据横向可比性，对正向指标和负向指标分别进行标准化处理，消除指标间的量纲影响，保证后续测算结果的科学性。

Table 2. Construction and weights of the economic development level indicator system with the intervention of data elements
表 2. 数据要素介入的经济发展水平指标体系构建及权重

一级指标	二级指标	三级指标	计量单位	数据来源	权重/%	指标方向
经济增长	市场规模	社会零售总额	亿元	《中国统计年鉴》	2.76	正
		技术市场成交额	亿元	《中国统计年鉴》	7.99	正
		软件业务收入	万元	《中国统计年鉴》	7.68	正
		电信业务总量	亿元	《中国统计年鉴》	4.80	正
		电子商务销售额	亿元	《中国统计年鉴》	5.57	正
	产业结构	第一产业增加值	亿元	《中国统计年鉴》	2.37	正
		第二产业增加值	亿元	《中国统计年鉴》	3.17	正
		第三产业增加值	亿元	《中国统计年鉴》	2.95	正
	数字产业化	ICT 年末就业人数	人	《中国劳动统计年鉴》	4.80	正
		ICT 行业平均工资	元	《中国劳动统计年鉴》	1.71	正
数字环境	创新环境	ICT 企业数	个	国研网	4.78	正
		R&D 经费内部支出	万元	《中国科技统计年鉴》	4.67	正
		R&D 经费投入强度	%	《中国科技统计年鉴》	2.68	正
	人才环境	国内专利申请授权量	项	《中国科技统计年鉴》	5.86	正
		R&D 人员全时当量	人年	《中国科技统计年鉴》	4.46	正
		研究生从业人员比重	%	《中国劳动统计年鉴》	5.77	正
数字基础	基础设施	每平方千米长途光缆线路长度	万公里	《中国统计年鉴》	1.65	正
		互联网宽带接入端口	万个	《中国统计年鉴》	2.45	正
		互联网普及率	%	《中国统计年鉴》	1.45	正
	网络资源	每万人拥有的网页数	个	《中国统计年鉴》	9.58	正
	用户基础	互联网宽带接入用户	万户	《中国统计年鉴》	2.65	正
		移动电话普及率	部/百人	《中国统计年鉴》	1.29	正
		每百家企业拥有网站数	个	《中国统计年鉴》	0.39	正
	企业应用	有电子商务交易活动的企业数	个	《中国统计年鉴》	4.30	正
		期末使用计算机数	台	《中国统计年鉴》	4.22	正

正向指标:
$$X_{ij} = \frac{X_{ij} - \min(X_{ij})}{\max(X_{ij}) - \min(X_{ij})}$$

负向指标:
$$X_{ij} = \frac{\max(X_{ij}) - X_{ij}}{\max(X_{ij}) - \min(X_{ij})}$$

⁴<https://data.cnki.net/yearBook/single?id=N2026030216&pinyinCode=YZLDT>

其中, $\max(X_{ij})$ 为所有年份中指标的最大值, $\min(X_{ij})$ 为所有年份指标中的最小值, X_{ij} 是标准化后的指标。

3.3. 测度结果分析

一是, 传统经济发展水平测度(2008~2013): 全国经济发展水平综合得分由 0.25 增长至 0.33, 整体呈上升状态, 年均增长率为 6.59%。分区域来看, 广东、上海、江苏、北京等 9 个东部沿海省级行政区得分位于全国均值以上, 中部省级行政区多处于中等水平, 西部地区除四川与重庆迈入中等行列外, 其余省级行政区发展较为落后; 东北三省发展步伐放缓, 已远跟不上东部地区步伐, 发展水平逐渐与中部地区相当, 传统东中西由高到低的发展格局出现细微变化。

二是, 数字经济发展水平测度(2013~2020): 全国数字经济发展呈稳步上升状态, 综合得分由 2013 年的 0.40 增长到 2020 年的 0.73, 年均增长率为 9.97%, 增速显著高于传统经济。分区域来看, 东部沿海的北京、广东、江苏等省级行政区仍位居前列, 中部地区的湖北与河南、西部地区的四川数字经济发展水平也高于全国平均水平, 表明数字经济对中西部部分省级行政区经济拉动效果明显; 但东中西整体差距仍存, 且区域内部分化加剧, 如东三省与东部其他地区的数字经济发展差距, 远大于传统经济发展阶段的差距, 川渝地区数字经济发展水平也显著高于西部地区其他省级行政区。

三是, 传统经济与数字经济的内在关联: 传统经济发展排名靠前的省级行政区, 在数据要素介入后数字经济发展也遥遥领先, 如北京、广东、江苏、浙江、上海等省级行政区, 其经济发展水平与数字经济发展水平均长期位于全国均值以上, 证实传统经济发展基础是数字经济发展的前提条件。数字经济推动中西部部分省级行政区由中等发展水平迈入高水平发展行列, 但未从根本上改变区域发展不平衡的现状, 反而进一步加剧了区域内部分化。

4. 数字经济区域发展格局的时空演变

基于数据要素介入后的经济发展水平测度结果, 运用 ArcGIS 自然间断点分级法, 从东中西差距、南北差距、城市群分布三个维度, 剖析 2013~2020 年我国数字经济发展的区域格局时空演变特征, 揭示数字经济推进区域发展格局演化的内在规律。

4.1. 数据要素推动区域经济增长, 西部增速领先但数字基础薄弱

数据要素的介入显著推动了各区域经济发展, 传统经济模式下各地区的年均增长率均低于数据要素介入后的水平, 其中西部地区在两种经济模式下的年均增长率均为东中西三大地区最高, 传统经济年均增长率 7.37%、数据要素介入后达 10.11%, 远高于东部(8.83%)、中部(8.26%), 源于西部地区传统经济基础薄弱、经济增长空间较大, 大数据产业布局为西部部分省级行政区带来发展契机。但数字基础设施不完善成为西部地区数字经济发展的核心短板, 2013~2020 年数字基础类指标对数字经济发展的贡献度持续提升, 2020 年数字基础、创新环境类指标权重整体高于其他指标, 而西部地区数字基建配套不足、数字技术人才短缺, 严重阻碍了数字产业发展, 进而限制了数字经济发展水平的进一步提升。

4.2. 东中西差距整体拉大, 传统格局重塑并形成新空间分界线

2013~2020 年东中西数字经济发展差距呈逐步拉大趋势, 2013 年东中西数字经济发展指数比为 3.2:1.1:1, 2020 年变为 3.3:1.1:1, 整体仍呈现发展水平由东至西依次递减的趋势。东部地区数字经济发展综合得分由 2013 年的 7.58 增长到 2020 年的 13.69, 年均增长率 8.83%, 增速趋于平稳且发展基础雄厚; 中西部地区数字经济发展综合得分由 2013 年的 4.51 增长到 2020 年的 8.25, 年均增长率 9.13%, 2016~2019

年增速甚至高于东部沿海地区，体现出政策驱动下的强劲发展潜力，但因基数较小，与东部地区的绝对差距仍在扩大。区域内部分化特征显著：东部地区广东(2.29)与海南(0.29)差距悬殊，中部地区内部发展相对均衡，湖北省(0.78)与吉林省(0.32)为区域内最高与最低，差距远小于东、西部；西部地区整体发展落后，且内部分化严重，四川省(0.85)为西部唯一跻身全国高水平的省份，而青海省仅为 0.22，区域内发展差距显著。数字经济发展格局呈现出偏离传统分界线的新特征，形成新的空间分界线：在胡焕庸线的基础上顺时针旋转 10 度左右，北起黑龙江萝北县、南至云南贡山独龙族怒族自治县，分界线以东为数字经济高速发展地区，以西则多处于中等或落后阶段。

4.3. 南北差距持续扩大，传统分界线北移且形成新划分

参考许宪春等(2021)的南北区域划分方法[11]，将北京、天津、河北等 15 个省级行政区划分为北方地区，上海、江苏、浙江等 15 个省级行政区划分为南方地区，对比分析发现，数字经济时代南北发展差距呈加速扩大趋势，传统秦岭－淮河南北分界线已不适用于数字经济发展格局。传统经济时代南北差距较小且增速缓慢，2008~2013 年南北经济发展水平得分差由 0.57 增加到 0.85，年均增长率不足 0.1%；数字经济时代，2013~2016 年南北数字经济发展差距变动较小，2017 年后呈快速扩大趋势，2020 年南北方数字经济发展指数分别为 13.07 和 8.87，差距达 4.2，区域之间数字发展水平出现明显分化。从区域发展特征来看，南方数字经济发展水平整体高于北方，且区域内发展更均衡，广东以 2.29 遥遥领先，上海、江苏、浙江等省级行政区均位居全国前列，有 7 个省级行政区得分超全国均值且格局稳定；北方地区各省级行政区之间发展差异较大，仅北京、山东持续高于全国均值，其余省级行政区多处于中等或中等偏下水平，且发展波动较大。数字经济发展的南北分界线呈明显北移趋势，新分界线西起四川省的石渠县、东至山东省的无棣县，分界线以南更多表现为数字经济发展的优势区域。

4.4. 数字经济沿城市群分布，形成中心化分布与三级分化格局

数字经济发展与城市群空间分布高度契合，2020 年我国 19 大城市群数字经济发展水平呈现显著的三级分化特征，且整体形成城市群中心化分布格局(见表 3)：第一梯队为长三角、珠三角、京津冀、山东半岛城市群，数字经济综合得分均大于 1，其中珠三角城市群以 2.29 居首，成为数字经济发展的重要引领者；第二梯队为长江中游、成渝、粤闽浙、中原等城市群，得分在 0.5~1.0 之间，处于中等发展水平；第三梯队为北部湾、黔中、哈长城、天山北坡等城市群，得分小于 0.5，主要分布于西部地区 and 东北地区，发展水平相对落后。城市群内部发展呈现显著的中心化特征，且高水平城市群中心城市的磁吸效应大于溢出效应：京津冀城市群依赖北京引领，河北、天津与北京发展差距悬殊；长三角城市群江浙沪对安徽形成人才、技术、资金虹吸，导致安徽发展滞后；成渝城市群四川扩散效应有限，与重庆未能形成有效联动，川渝之间的发展断层使其难以形成协同发展效应。而低水平城市群因数字基础薄弱、人才流失严重、资金短缺等问题，尚未形成中心化发展格局，内部各省级行政区发展水平相当且均偏低，与高水平城市群的差距持续拉大。

Table 3. Digital economy development of urban agglomerations in 2020
表 3. 2020 年城市群数字经济发展

城市群	省级行政区	数字经济综合得分	均值
京津冀城市群	北京	2.08	1.11
	河北	0.64	
	天津	0.6	

续表

长三角城市群	江苏	1.7	1.32
	浙江	1.5	
	上海	1.38	
	安徽	0.71	
珠三角城市群	广东	2.29	2.29
长江中游城市群	湖北	0.78	0.64
	湖南	0.65	
	江西	0.48	
山东半岛城市群	山东	1.19	1.19
成渝城市群	四川	0.85	0.72
	重庆	0.58	
粤闽浙城市群	福建	0.76	0.76
中原城市群	河南	0.75	0.75
关中南城市群	陕西	0.66	0.66
辽中南城市群	辽宁	0.58	0.58
山西中部城市群	山西	0.38	0.38
滇中城市群	云南	0.38	0.38
北部湾城市群	广西	0.37	0.33
	海南	0.29	
黔中城市群	贵州	0.35	0.35
哈长城城市群	吉林	0.32	0.32
	黑龙江	0.31	
呼包鄂榆城市群	内蒙古	0.31	0.31
兰州 - 西宁城市群	甘肃	0.29	0.26
	青海	0.22	
宁夏沿黄城市群	宁夏	0.29	0.29
天山北坡城市群	新疆	0.25	0.25

5. 结论与建议

(1) 研究结论

本文采用熵值法与主成分分析法，测度我国 30 个省级行政区的数字经济发展水平。研究表明，传统经济高度依托对外开放，数字经济则更依赖数字基础与经济增长条件，西部地区面临对外开放不足、数字基建与人才短缺双重约束。数据要素虽能够拉动区域经济增长，但也加剧了区域内部分化，依托较好的基础，中西部部分省级行政区实现发展提升，而东北、西部非川渝地区和发达地区的差距仍在扩大。东中西数字经济绝对差距有所拉大，中西部增速优势受基数限制未能转化为差距收敛，数字经济格局表现出区别于传统地域划分的分界趋势；同时南北发展差异不断扩大，南方整体活力占优，传统秦岭 - 淮河分界线适用性下降，南北分界出现北移。数字经济要素向城市群集聚，呈现三级分化的中心化空间格局，高水平城市群中心城市磁吸效应大于溢出效应，低水平城市群尚未形成有效增长核心。

(2) 政策建议

基于上述研究结论,结合我国各区域数字经济发展的实际特征与短板,从东部升级、中西部夯实基础、提升西部对外开放水平、促进城市群协调发展四个方面,提出针对性政策建议,推动数字经济时代区域协调发展:

一是,推动东部地区数字经济高水平升级,打造数字产业创新发展高地:东部地区依托完善的数字基础设施与雄厚的发展基础,继续推动数字产业化发展,培育一批具有区域竞争力的数字经济核心产业企业,提高数字产业增加值;同时推动数字经济与实体经济深度融合,加快发展智慧政府、智慧教育、智慧医疗、智慧交通等新业态,积极培育要素市场,构筑开放型数字经济创新高地。

二是,夯实中西部数字基础设施建设,培育区域数字经济增长极:中西部地区聚焦数字基础设施不完善的核心短板,针对性完善光缆、互联网宽带接入端口等数字基建;中部地区应积极打造具有影响力的数字经济产业集群,培育数字经济核心产业,建设数字经济创新引领示范区;西部地区可依托本地算力资源禀赋,加大数字技术研发与人才引育力度,积极发展农村农业电子商务、智慧仓储、智慧物流等特色业态,推动传统产业数字化转型升级。

三是,提升西部地区对外开放水平,构建双向互济开放格局:针对西部地区深居内陆、向东开放运输成本高的问题,充分发挥其“一带一路”倡议和西部陆海新通道战略叠加区的区位优势,抢抓发展机遇,坚持“引进来、走出去”相结合;深化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数字经济交流与合作,加大招商引资力度,培育数字经济龙头企业,早日形成“陆海内外联动、东西双向互济”的对外开放格局,以对外开放带动数字经济与实体经济协同发展。

四是,促进城市群内部协调发展,强化中心城市溢出效应:针对城市群中心化分布及磁吸效应显著的问题,高水平城市群的中心城市应在保证自身发展的前提下,建立区域要素流动机制,推动数字技术、人才、资金等要素向周边地区流动,强化中心城市的溢出效应,破解“磁吸效应”困境;低水平城市群应加强与高水平城市群的合作对接,承接数字产业转移,完善数字经济发展配套体系,加大数字人才引育力度,培育区域增长极,推动城市群协调发展。

基金项目

山东省社科联入库在研课题:综合保税区辐射带动能力提升创新研究(QIT25KF001)。

参考文献

- [1] 中国数字经济发展研究报告(2025年)[EB/OL].
<https://hzfimage.mofcom.gov.cn/attach/202604/20260408151658755.pdf>, 2026-10-29.
- [2] Tapscott, D. (1995) *The Digital Economy: Promise and Peril in the Age of Networked Intelligence*. McGraw-Hill, 156-168.
- [3] 宋洋. 经济发展质量理论视角下的数字经济与高质量发展[J]. 贵州社会科学, 2019(11): 102-108.
- [4] 郑嘉琳, 徐文华. 数字经济助推我国经济高质量发展的作用机制研究——基于区域异质性视角的分析[J]. 价格理论与实践, 2020(8): 148-151.
- [5] 王娟娟, 余干军. 我国数字经济发展水平测度与区域比较[J]. 中国流通经济, 2021, 35(8): 3-17.
- [6] 刘家旗, 茹少峰. 数字经济如何影响经济高质量发展: 基于国际比较视角[J]. 经济体制改革, 2022(1): 157-163.
- [7] 刘传明, 尹秀, 王林杉. 中国数字经济发展的区域差异及分布动态演进[J]. 中国科技论坛, 2020(3): 97-109.
- [8] 王军, 朱杰, 罗茜. 中国数字经济发展水平及演变测度[J]. 数量经济技术经济研究, 2021, 38(7): 26-42.
- [9] 曹萍萍, 徐晓红, 李壮壮. 中国数字经济发展的区域差异及空间收敛趋势[J]. 统计与决策, 2022, 38(3): 22-27.
- [10] 唐先滨. 中国数字经济发展水平测度及区域异质性[J]. 江汉论坛, 2025(4): 28-37.
- [11] 许宪春, 雷泽坤, 窦园园, 等. 中国南北平衡发展差距研究——基于“中国平衡发展指数”的综合分析[J]. 中国工业经济, 2021(2): 5-22.